

流求王欢斯渴刺兜： 台湾历史上的“印度化时代”

□ 鲁西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波罗檀与低没檀

《隋书·流求传》起首述流求国之政治结构，谓：“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罗檀洞，塹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

此言流求王所居（当即王都）名为“波罗檀洞”。《隋书·陈稜传》则记陈稜率隋军登陆后的战事云：“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稜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击败之，斩老模。”则知流求国的小王欢斯老模所居称为“低没檀洞”。六朝隋唐文献中，以“洞”指称南方山区普遍存在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地带，故《隋书》将流求王与小王所居称为“洞”，并不足异；令人注意者，乃是分别称为“波罗檀”与“低没檀”的二“洞”之名。

新会县境内的谭波罗山与信安县境内的乾陀婆城均位于珠江下游的东南岸，可以断定都是珠江入海口处的山岛洲屿。乾陀婆城之语出印度语，揣测“谭波罗”一词，可能亦与印度语言或佛教有关。

二、欢斯渴刺兜与欢斯老模

据《梁书·扶南传》，扶南初王，称为“混填”，《南齐书·扶南传》同，《晋书·扶南传》作“混溃”，一般以“混填”为是。其后王称为“混盘况”。以汉人称名惯例，“混”或“混填”当为其姓（若以“混填”为姓，其“混盘况”之“混”当为“混填”之略写）。混填之人据扶南为王，自伯希和以来，均定在公元1世纪或其下半叶；而伯希和、赛代斯诸氏，均已指出“混填”或来自印度，或来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

伯希和更断定，“混填”之名，当出于印度语，即在南印度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氏族僑陈如。芬诺和赛代斯则分别根据传说和柬埔寨所出碑铭加以详细论证，遂使之基本成为定说。流求国王及其小王姓“欢斯”。此“欢斯”，大抵可以断言，很可能就是“混”或“混填”的另一种汉译写法。然则，7世纪初叶的流求王族欢斯氏，很可能就源于南印度的僑陈如氏族。

若果如此，则流求王之名“渴刺兜”、小王之名“老模”也都应当出自印度语。

据此，几乎可以断言：流求王室很可能来自在此前为真腊所吞并的扶南，而扶南的王室则来自南印度著名的僑陈如氏族。

流求王居舍多雕刻禽兽之形，轿椅之类用具亦镂为兽形，此俗亦见于扶南王族。《晋书·扶南传》谓扶南“好雕文刻缕”，正与此相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扶南王族之始祖的混填来自海上，而且本来是一个神巫，“事鬼神者”。虽然证据不足，但仍然可以推测，他被扶南王族当作神明祭祀着，而因为他来自海上，很可能被视为“海神”。至此，可以给《隋书·流求传》所谓“俗事山海之神”提供了一个解释：流求王族所事的“山神”应即湿婆教的天神，摩首罗；“海神”则是其始祖，来自海上的混填。

三、台湾历史上短暂的“印度化”时代

综上所述，可以认知：当7世纪初隋军征流求时，在台湾岛上有一支很可能来自扶南的王族，其王姓欢斯，即扶南王姓“混”或“混填”，亦即来自南印度的著名氏族“僑陈如”；他们在流求“移植”了扶南旧都毗耶陀补罗、特牧城之名，将王都称为“波罗檀”，小王所居称为“低没檀”；他们信奉湿婆教，将摩首罗视为山神，并崇拜其扶南始祖、来自海上的混填（海神）。因此，这是一支印度文化特色非常明显的王族。

根据征流求隋军自义安郡出发，先至高华屿，东

行三日便至流求的航海路线,以及登陆流求后的战事进程,结合后世郑成功取台湾时的进军路线,论者一般将隋军所征的流求国(或其国都与核心部分)定在今台湾南部,特别是安平港一带,但主要基于推理,并无可靠的实证。本文亦未能提供扶南与流求间的海上航行史料,以加强这一认识。但当时的流求国,以今台湾南部为中心,大约是可信的,虽然证据仍感不足。

扶南裔流求王族统治的地域究竟有多大,亦无资料足以说明。据上引《隋书·流求传》,在国王之下,流求国分置四五个“帅”,每“帅”统有若干个“洞”(洞各有小王)、“洞”下统若干“村”(有“鸟了帅”为长)。则当时的流求国已形成层级制的控制体系,其疆域不会太小。然《隋书·流求传》又说流求“国人好相攻击”,“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则流求王及其诸帅对于诸洞并无较强的控制权,各洞大抵均得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说,“犯罪比断于(村)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则村鸟了帅与民众皆可直接上事于王,诸帅、洞小王的层级性并不清晰、稳定。

流求王渴刺兜与隋军决战时,所率之军队为“数千”。隋军击败流求军队,掳掠流求人口而归。隋军所虏流求人口数量,《隋书》的《陈稜传》与《流求传》都说是“男女数千”,而《炀帝纪》则称有“万七千口”,当有较大夸张,盖以“数千”较为切实。其所虏流求人口中,包括流求王子岛槌,也应当有其他王族成员。据《朝野僉载》,隋军将掳掠的流求人口中的壮年男子,都用铁钳锁着,经过南海郡,送到江都(当时隋炀帝正在江都)去献俘,“人形短小,似昆仑。”其所谓“昆仑”,当然是指唐人常说的“拳发黑身”、“人形短小”的昆仑,而不会是误为“古龙”的扶南王族。这些“人形短小,似昆仑”的流求俘虏,与《隋书·流求传》所描述的“深目长鼻,颇类于胡”的流求人,绝不会是同一种人。

因此,7世纪初叶的流求国,实际上有两种人群:一种是来自扶南、居于统治地位的流求王族,他们“深目长鼻,颇类于胡”,饮酒之习“颇同突厥”;他们居于雕刻着禽兽(很可能是大象)纹饰的宫室里,居舍的四周种着可能是“吉树”的斗缕树;在旁边的山上祭祀他们的神,湿婆教的天神摩首罗;他们中的王子或智勇之士可能被任命为“帅”或“洞”的小王,承担起征讨并治理地方的责任。另一种是流求的土著,“人形短小”,与唐人心目中的“昆仑人”相似。

很难推究这一支出自扶南王族的流求王室何时来到了台湾。本文虽然揣测他们可能是在真腊并扶南的过程中,从扶南流亡而来,但证据尚嫌不足,论证也仍存空隙。即使承认这一假设,由于学界对于真腊并扶南的历史过程及其实质并没有充分而可以

完全信赖的认识,也只能大致将这一过程定在6世纪后半叶。

也就是说,流求王族从扶南来到流求的时间,在以上两个推测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基本确定在6世纪后期。而从7世纪初流求王族对流求的实际控制及其对流求土著文化的影响力看,他们对流求的统治应当不足半个世纪。

尽管如此,本文仍倾向于使用“印度化”这一概念界定扶南裔流求王族统治台湾的这一时期,将之称为“台湾历史上短暂的‘印度化’时代”。众所周知,“印度化”是一个有着广泛争议的概念,对其内涵、意义与历史过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众说分歧。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把“印度化过程”理解为一种系统的文化过程,而这种文化建立于印度的王权观念之上,其特征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等印度宗教的崇拜,印度系统的神话传说等方面,并以印度语言文字作为表达工具。大多数学者同时也相信,在“外印度”发展起来的“印度化文化”,主要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其统治人群(无论其是否来自印度)“印度化”的同时,当地被统治的土著人群却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特征的社会与文化。

沿着同样的理路,本文把6世纪后期至7世纪初扶南裔流求王族统治下的流求文化定义为“印度—夷洲文化”。使用“印度”而不是“扶南”,是因为扶南王族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印度文化,对此,前人已有的精深的研究与深入揭示;使用“夷洲”而不是“流求”,是试图借此强调其土著人群乃是《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记“夷州(洲)”人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我们迄今并不能确定“流求”一词究竟来自扶南、印度还是其土著人群。显然,扶南裔流求王族代表的印度文化仅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影响范围较为狭小,深度也非常有限;而夷洲人的土著文化则代表了台湾本土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更为广泛、深厚的根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标,并非仅在于揭示台湾历史上存在着这一短暂但可能十分重要的时期,还在于给所谓“印度化”标出一个北界。虽然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对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曾带来广泛、深入而长远的影响,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存在着许多印度教遗存,但以印度王权观念为核心的“印度化进程”却并未及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及东北亚地区。6世纪后期至7世纪初叶流亡的扶南王族在台湾岛建立的流求国,却显然是建立于印度王权观念基础之上的,它应当是最北的“印度化王权国家”。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约18000字